

王开林 著

裱糊匠

在晚清的凄风苦雨中，真正能唱压轴戏的唯李鸿章一人而已。然李鸿章尚且自嘲为「裱糊匠」，别人又岂能扮演更像样的角色呢？

王开林 著

裱糊匠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裱糊匠/王开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
(微阅读大系·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6)
ISBN 978-7-309-10094-5

I. 裱… II. 王… III. 名人-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831 号



裱糊匠

王开林 著

责任编辑/李义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79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978-7-309-10094-5/K·451

定价: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自序 纸糊的大厦到处着火 / 1

魏源 《海国图志》 / 5

郭嵩焘 中国人闭门自尊大 / 29

李鸿章 裱糊匠演独角戏 / 57

张之洞 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 / 121

纸糊的大厦到处着火（自序）

在个人和群体的诸多梦想中，强国梦涉及的范围最大，实现的难度也最大。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知难而进，在逆势下挣扎，在绝境中抗争，非要兑现这个梦想不可，观其倔犟执著的劲头，绝非语言文字可以形容。

道光二十年（1840），扃闭（jiōngbì，关门）的国门被列强的开花大炮轰然打破，通商的好处得着不多，鸦片的流毒却受着不少。遇此数千年未有之剧变，林则徐力主禁烟，同时尽可能地了解外部世界的详情，掌握其大要，以求知己知彼。他委托魏源编辑《海国图志》，使蒙昧的国民对五洲四洋的地理、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粗浅的认识。更难能可贵的是，魏源为强国梦勾勒出一幅草图，将核心主张“师

夷长技以制夷”和盘托出，这种以实用科学技术救国的理想乃是救焚拯溺的方便法门，对于孔孟之徒而言，已是一剂狼虎猛药，很有些吃不消，即使是那些洋务运动的先驱和后继，也多半浅尝辄止，真正全心全意拥抱西学西技的人万不得已。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帮国人找到了心理平衡点，但其内部冲突仍然剧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西学，即使是当时最精英的中国士绅，也陷入了鬼打墙的窘境和困境。

魏源之后，思想上真正有所突破和突进的是郭嵩焘。他首任大清帝国驻英公使兼驻法使臣，了解欧洲强国的政治、文化、历史，比魏源更直观，也更深入，观察更细致，也更翔实，因此他的见地更超卓，更高明，他认为学习西方科技只能治标，学习西方政教才能治本。这样高超的见解，别说慈禧的花岗岩脑袋领悟不了，就是在洋务派中，也是如闻天书，仿佛秋风射马耳，对牛弹琴。

强国梦做到暮年的李鸿章那儿，已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大清帝国纸糊的大厦到处着火，他是消防队长，灭火不暇，分身乏术，可叹他扑救和补救的手段有限，办法奇缺，无非是割地，赔款，开放沿海口岸，牺牲矿权和路权，为此讨价还价。列强轮番进行分赃竞赛，十有八九他都是现场的第一见证人，这种难堪的角色与其强国理想所形成的冲

突之大，所造成的屈辱之深，是很难被外人所谅解和理解的。慈禧太后至死不悟，中国为什么处处不如外国？她紧握权杖，大发雌威，将两个皇帝（同治和光绪）拘在其卵翼下，整治得全无雄风，也将大清帝国拘在其羊皮灯笼中，收拾得黯淡无光，军费供其修乐园，民财供其筑阴宅，国家由这样浅见短视、穷奢极欲的人来领导，强国梦不变成噩梦也难。甲午海战后，接踵而至的是戊戌政变和庚子拳乱，李鸿章殚精竭虑，收拾无可着手的烂摊子，纵然用尽浑身解数补罅（xià 裂缝）善后，亦莫能救济其万一。悲哉李鸿章，干的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苦役，背的是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

近年，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张之洞的另一个更为出彩的角色定位上，他被视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想要强国的人，最终却走向了愿望的反面。

强国梦为何难以兑现？国家之强，要举世公认，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慑群敌，很好，但还不够；有无远弗届的劲旅止戈为武，很好，但还不够；有积若丘山的财富藏于国库，很好，但还不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引以自豪，很好，

但还不够；有幅员辽阔的领土生息万民，很好，但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国家精英要能设计出一个保障民有、民治、民享的可行性制度，使之臻于完善而无颠覆之忧。欧美几大强国的成功，早已为中国示范。然而，当救亡压倒一切时，当精英们各怀私虑、各打自家算盘时，制度设计必然付之阙如，或者弄成四不像。美国之所以有今日之强大，与当初联邦党人的深谋远虑息息相关，与那些社会精英谋及当代更谋及千秋的智慧息息相关。在晚清的凄风苦雨中，又何尝有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李鸿章尚且自嘲为“裱糊匠”，别人又岂能扮演更像样更有作为的角色？

科技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文精神三者齐备所产生的合力，乃是一个国家上升和强大的原动力，三缺一，三缺二，都将前途堪忧。

魏源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博采众书，令数千年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中国人饱饱地开了一回眼界，对久患自闭症的国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荡心涤肺的作用。

从先秦迄于晚清，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中国人两千多年都在吃老本。不用说，我们的老祖宗也有硃牙的时候，匈奴入侵，五胡乱华，蒙古灭了南宋，满族入主中原。但老祖宗很快就用孔仁孟义将那些凶悍之至的“夷狄”同化了，于是，他们仍然能够从痛苦和屈辱中获得阿Q式的精神满足。“对于蛮族，文化上的失败抵消了军事上的胜利；对于中华，文化上的胜利则补偿了军事上的失败”，这种情形多多少少使汉民族的读书人产生美丽的错觉：老祖宗的遗产已足够完美，足够精粹，可以对那些舶来的奇技淫巧应付裕如。于是，他们心乃安然，要么一头钻进尘封的故纸堆，整理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要么干脆大打其呼噜。

殊不知，这个久已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国——被马克思视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正置身于火药桶上，沉疴痼疾，一时俱发，天朝上国的威严即将扫地以尽。道光二十年(1840)，并不吉利的英吉利炮弹轰掉了清朝的“门

牙”，惊醒的士大夫——诸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是毒源，不可不禁，但断掉了日不落帝国的财路，在外交与军事上，必然会招致异常凶猛的老拳和重炮。

近代中国当政者值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遭遇的又是从海上出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关键之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到抵御外侮的办法，受欺负的次数多了，挨打的一方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洋人船坚炮利，我也要船坚炮利；洋人有铁路轮机，我也要有铁路轮机；洋人有声光化电，我也要有声光化电。但要造出杀伤力空前惊人的坚船利炮，天朝上国还得放低身架，去低声下气向洋人学习。老朽的大清帝国骄妄惯了，二百年紧抱不放的“天朝中心论”行将瓦解，这口心气如何能平？

“师夷长技以制夷”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特使马戛特尼公爵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在朝堂上拒不叩头，如此一来，以“四夷宾服”而志骄意满的天潢贵胄才发现世界之大，居然会有不肯下跪的硬膝头。1838年，雷夫查尔斯·古茨拉夫在他的

著作中描述大清帝国：“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以不可言状的轻视态度看待其他任何国家。”大清帝国自雄自傲，自居为顶级文明的核心国度，将本国之外的“夷人”统统视为野蛮人。马戛特尼公爵晋见乾隆皇帝之后不足五十年，鸦片即源源而至，炮弹则纷纷而落，清王朝穷于招架，郁闷认栽。

清朝闭关锁国一百多年，一局酣梦被英国人的大炮震成碎片。那些天朝上国的海防将领久已不娴业务，他们初次看到英国战舰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无风鼓帆，无人操楫，偌大的船身为何能够进退自如？他们认为，这是洋毛子的邪气作祟，于是派士兵到城里和乡下广泛收集妇女的夜壶（溺器），以它们为“压制具”，放在炮台和船舱镇邪。结果是，清军的这种做法就轮到英军不敢相信他们的常识了。那时候，中土和外洋的信息竟如此不对称，令人发噱（xué，笑）。但夜壶是挡不住军舰的，正如义和团的护身符挡不住子弹一样，世间多有比狼牙棒更厉害的狠家伙，于是天灵盖危乎殆哉。

中国士大夫的“强国梦”该从何处做起？湘人魏源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且把面子观念搁置一旁，老老实实拜洋人为师，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显然是“科技救国”思想的原始版本，在当时已算得上最为激进的

主张，只有林则徐、陶澍、龚自珍、汤鹏、贺长龄等少数人热烈响应和支持。林则徐痛感中国“器不良也”和“技不熟也”，他认为要改变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从“器”与“技”两方面迅速入手。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之后，中国政府高层发起的力图自救自强的洋务运动勃然而兴，一大批“中兴名臣”（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陆续加入进来，他们奉为圭臬（guīniè，准则和法度）和指南的依然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加侧重于造船制器，视此为强国振邦的首要本钱。曾国藩一向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的言行如何？“剑戟不利，不可以割断；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他办洋务最讲究的就是操兵造械之法。1865年夏，丁日昌筹建江南制造局，李鸿章上奏朝廷，这样写道：（兵工厂一旦建成），“尤有望于将来，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李鸿章还说过，“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清朝重官抑商，官督商办的军事工业最终走入死胡同，豪商不兴而劲卒全无，这居然没有促使素称机警的李鸿章认识到比制器之器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必须严格遵照市场规律行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相当遗憾的事情。在镇压太平军后不久，曾国藩和

李鸿章对清王朝的政教体制依然充满信心，并没有产生病入膏肓的忧虑。既然他们认为根本未坏，治标即可获奏全功，洋务运动所追求的自强就望山跑死马了。最好的例证是，曾国藩为赴美学童所定的章程中规定，他们除了学习西艺，还必须由中方教师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以免这些留学生数典忘祖。这就不免使我眼前显现出滑稽的景象：一位着装半土半洋的病人（清王朝）左脚穿着牛皮高跟鞋（西方的科技），右脚穿着布面平底鞋（中国的政教），他居然想跑得比赛马（列强）还快。

《海国图志》的出炉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良图，后改名为源，字默深，法名承贯。少小时，他就“寡嬉笑，常独坐”，勤奋好学，常熬夜苦读，母亲反复催其熄灯，甚至哭求他爱惜身体，魏源才稍稍有所松弛。九岁时，他应童子试，县令出上联“杯中含太极”，他对下联“腹内孕乾坤”，气魄之大，抱负之伟，令考官刮目相看，赞不绝口。

魏源与龚自珍齐名，会试时曾双双落第，当时的人鉴刘逢禄赋《两生行》，哀惜不已。《汉书·扬雄传》称传主“口

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魏源仰慕扬雄的才名，同样寡言精思，他取字为默深，确实很有自知之明。表面看去，魏源是个书呆子，年轻时，他“默好深湛之思”，醉心于各类典籍，一入书斋，就足不出户，偶尔出门，竟会引致家狗和邻犬的群吠。他“寡言笑，鲜嗜欲，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至友晤谈，不过数刻，即伏案吟哦。舟车中，铅黄不释手”。实际上，魏源是个极为关注古今成败利病的读书人，年轻时他曾在自家厅堂柱子上题写楹联一副：“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魏源于学无所不窥，他所师从的胡承珙、姚学棻、刘逢禄、董桂敷、包世臣都是当时品学兼优的大儒。难能可贵的是，他博涉旁通，对盐政、漕运、水利、赋税等当世实务具有精到的见解。魏源一生不怎么走运，他当了几乎半辈子幕僚，直到五十岁以后才做了两任知县和一任知州。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和林则徐政绩卓著，其中都有魏源出谋划策的功劳。他们既是上下级，又谊兼师友，共同寻求强国之道，魏源的头脑是当时最睿智的头脑，陶澍和林则徐均表示过由衷的钦佩。

《清史稿·魏源传》称赞魏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他曾建议将黄河改回北行故道，没人理睬，五年后，铜瓦厢

决口，黄河果然北流。真是让人想不通，魏源是一流人才，在科举路上却多年蹭蹬（cèngdèng，困顿，失意），如果说他二十九岁应顺天府乡试高中第二名（俗称“南元”）还不算太迟，那么他五十二岁才考取进士则绝对可算是桑榆晚景了。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乡试前，魏源的好友、湖南老乡、大书法家何绍基作了一首七绝《柬魏默深》，诗中流露出担忧之情：

蕙抱兰怀只自怜，美人遥在碧云边。

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

所幸这一次魏源高中顺天乡试第二名。其后，魏源多次进京会试，频频受挫，他倒是愈挫愈奋，就是不肯服气认输。道光二十三年（1843），魏源进京赴试甲辰会试，在致好友邓显鹤的信中，他大吐苦水，且自我调侃道：“自海警以来，江淮大扰，源之生计，亦万分告匱。同人皆劝其出山，夏间当入京师，或就彭泽一令，或作柳州司马矣。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会试时，由于文稿草率（卷面不够整洁），他被罚停殿试一年。在这段郁闷期，他作诗《都中吟》十三首，第一首即讽刺八股取士，诗中有这样的句子：